



魏燮中教授序

《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为蝼蚁般的生命立丰碑

终于见到了这部闻名已久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以下简称《大辞典》）。

风尘仆仆的“朴实无华”；其实还是“半成品”，却已汇聚起近三万多人，连带他（她）们家人六十多年的“委屈”，悄然于此，希望能得到您的关照与检索，以期您回顾曾经的“毛时代”，将就那些无端的悲怆，加码您的心悸。

号称“奇迹”的“兵马俑”引中外旅人“赞”“颂”，悠悠的目光越过殉葬人残碎的骨骸，越过肃立了两千多年的“地下兵团”幽幽眼神，颂“秦皇丰功”，赞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却又有谁能体会得“兵马俑”劳役艰辛，心中的酸楚？！

心愿这部《大辞典》能得“传统精髓”之一二，“不久”之于将来，或亦有机会众目毛泽东“无中生有本事”，睽睽其糟蹋我民族意志之“伟绩”。

德国柏林、美国波士顿为纪念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人建起纪念碑，人们前去凭吊，正义涤荡邪恶，震慑或许的“纳粹芽苗”；1957毛泽东的中共打了55万（众多研究所得的意见，此数应为300多万）右派分子，1978年为之“改正”（注意，是“改正”不是“平反”），然而，别说是“纪念碑”，如今连个“话头”都成禁忌，“新毛派”可以在公开场合张牙舞爪，你若悄悄嘀咕个

“1957”、“8964”试试，看会不会有人来给你做做“推拿”，“松松筋骨”。所以我们特别感谢武宜三先生，就是个不图名不图利的人在编这部记录右派分子苦难经历的《大辞典》，容那些犹想在寂寂之中发一点愤懑之声的人有所依藉。

武宜三先生寄《大辞典》给我时嘱我为《大辞典》作序。我吃了一惊。人不能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我也不至于不知道自己的“几斤几两”，实在不敢生有贸然借势上台充“大个儿”的勇气。然而转过念来又一想，武宜三先生之所以会邀无名之辈的我作《序》必有其“理由”，不太可能会是一种“冲动”；“换位思考”之下似乎悟得一些“缘由”，其实就是他的无可奈何。

《大辞典》不是文艺作品、学术论文，而是一种带有“主题”或曰“专题”的工具书，特殊的内容就需要了解其产生背景的人来作介绍。按说这样的“个中人”并不难找。1957 那场“运动”整的就是知识分子中的“出头椽子”，多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便是闻名中外的大师级人物也有不老少差强于“某人”的好恶之间忽忽地被戴上“帽子”；如此这般的一个群体，从中找个写手写一篇《序》那可真应当说是轻而易举。然而，谁能想到，六十多年过去，才有人出面来张罗这样一件（本该，也早该由国家来做的）事，1957 年的“英才”多已化为“英魂”；这才露出了不论年龄、学历、资质、才具都属当年“小字辈”的我，让这个其实也已步入“耄耋之列”的我欣欣又惴惴地应承此事。

我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优势。从 1958 到 1980，我被送往柴达木盆地中的劳改农场度过了我劳改与“准劳改”的“金色年华”，在那鱼龙混杂的环境里，有幸遇见不少怀具真才实学（按狱方救命应称“同犯”）的“同学”，我从那些可师可友亦师亦友的“同学”（或是“同犯”）那里听到了许多“外面”听不到的“论语”，看到了许多“外面”看不到的“把戏”；“三九天”枵腹烂衫于凛凛高原沙风中垦荒造田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生活”，从本已无伪可作了的环境中看“管教”津津有味地凉拌热炒谎言的“幽默”中开发心智；在“监狱大学”读了 23 年“研究生”，自认为算是看清楚了“1957”，也就有了勇气恬然为《大辞典》作“序”。

顺便说一句，在这篇序文中，我将一改旧习，举例一律“实名制”；一则，序文将效当年所谓的“歌（功颂）德派”，对我的“57 难友”（和部分“非 57 难友”）隐恶扬善，并非全为避免“口舌”，更为了与《辞典》同步，扬“我”威风灭“他”志气。其次要作一点声明：1957 年冬“处理右派”时有一条“原则”叫做“右派不触犯刑律不予逮捕”，按此一说，监狱中就不该有“57 难友”了？不！有的是。这里的“57 难友”大致有三类：一是“自投罗网”型，比如敝人我，熬到 1958 春天因“企图偷越国境”从深圳抓回判刑入狱；二是“加码加注”型，例如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雷光凡在校时犯有“贪污（摘录文献用的）卡片纸”的行为，单单以此而论，似乎不够判刑，于是从这个中国近代史课程助教的教学活动中找上几句“似是而非”，“加码”而成“触犯了刑律的右派”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三是“顺水推舟”型，例如南京某机关文员，“旧社会”学法律的孙世祚，抗战时期曾在“三战区”任军法官，虽然抗战胜利后脱离军队没有参加“内战”，但是领导看不得“留用人员”在我“革命队伍”中“耀武扬威”，于是“历史反革命”加码右派，判刑十二年。读者可以从这部《辞典》收录的几万“受难者”资料中看到许多更丰富也更荒唐的事例，藉此，您就可以理解，正是毛泽东 1957“全民 Satan”的尝试空前成功，才使他敢于在八年后的 1965 肆无忌惮地玩弄手段搞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一，1957 的“悖论”

在毛泽东制造的“运动”中，1957 年的运动可谓“怪异”，怪异到什么程度呢？2017 年香港集会纪念“六十周年”时，研讨目录中竟然有应该如何给“这个运动”冠名的议题；这，充分反映了虽然已经过去了 60 年，可是人们对“运动性质”的

认识仍然难趋一致。

我不相信毛泽东的“阴谋论”，但我相信“1957 受难者”中的大多数的是相对于左的右派；问题是当年我们都不曾认识到这一点，毛泽东同样也不会有此认识，因为他毕竟是“人”不是“神”。

就像是一道悖论——“你”不承认是右派那你算个什么（争民主、自由的）“受难者”？！可是，既然“你”自认“受难者”，六十年来又为什么口口声声“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查阅当年的报刊、杂志、六十年来亲历者、个中人的回忆录，也包括今天放在你我面前的这本《大辞典》，不难发现绝大多数文字的主旨就是一个字——“冤”。什么是“冤”？《说文》对这个字有非常形象的解释：“屈也，从兔从门，兔在门下不得走，益屈折也”；“门下”的“兔”为什么“不得走”呢？当然是因为失去了“自由”；“门下”与“兔”是一对矛盾，失去了自由的“兔”既“益屈折也”就不会对“门下”没有意见。

这个“门下”就是“党”和“社会主义”，关键是当年的“兔”只认得书本上的“主义”，以至于忤逆了拿“主意”当主义的“主义”，却还天真地自以为是没有反对“主义”而“冤”声不绝。

1957 的“运动”其实是一场“遭遇”而不是毛泽东事先设下的“伏击”，只能算是个“事件”；但是俯勘毛一生的韬略，你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的确就是他成功地编织“阴谋”、“阳谋”造就下丰功伟绩中的一页。

《大辞典》不是《传记》，我也没有能力研究“辩证”的“哲学”的学术课题；我只想借《大辞典》平台，用我之所经所历，尽可能地“还原”一个 1957 真实的“我”、一个 1957 真实的“你”。

据说毛泽东一生读过 17 遍《资治通鉴》，他当然懂得“政治”不必定相容“伦理”的玄秘；讲“伦理”毛泽东算得上流氓（此“头衔”乃杨开慧首冠），但是这一点都不耽误他成为“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

红军在陕北站稳脚跟，毛泽东当上真正主席以后，立即显露出他高于前任的政治才能，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抗日”，一面是“新民主主义”；“抗日”大旗容他名正言顺地与蒋介石争地盘，抢人才，“新民主主义”大旗成为他对抗、抵制最后夺取蒋介石独裁政权的“法理”。一切都“顺天承运”般地“按计划进行”，1949 年 10 月 1 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他成为了千万，亿万中国人景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别说是草根百姓，也不论“政学两栖”的贤达、学者，即如陈寅恪、刘文典这样一些秉承儒家传统向以“狷介”闻名的学者都服膺而默默，从 1949 到 1957 春天，大陆中国（至少表面上是）一片祥和。事隔 60 年，回顾彼时，我以为绝大多数大陆中国人相信“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跟“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甚至佛家“净土”的“西方极乐世界”差也无几。

1959 年春，我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认识了一位“老乡”石延汉，他是南京大学气象系教授，1947 年台湾“二·二八事件”时，正在基隆市长任上的他因“职责所在”而“参与镇压”，事态平息后，他随同光复台湾第一任行政长官陈仪被当作“替

罪羊”赶出台湾，嗣后，他就聘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前身之一），1955年“肃反”被捕，1956“免于起诉”放回学校工作，1958仍复旧案判处10年徒刑。此人极其聪明（参见拙著《丁酉纪事——荒原的隐私》），儒雅风度，睿智的谈吐，过去身份、地位的光环犹在“闪烁”，他当然地成为了我们这些“集结待命遣送青海”“已决犯”的“精神领袖”，然而在一众“粉丝”中，他独独与我交集最多；出人意外的是：“悄悄话”不仅不反动，反之，他向我表述“立志做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决心，一种“悟既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情愫。

这篇《序》如果有幸被我们所谓的80后、90后、00后读及，可以想见的一定是口吐莲花“装逼”二字（顺便作个说明，“装逼”乃是引用，自己造句决不会用此涉嫌造假作伪的“逼”字），其实，作文至此，我自己同样也“汗毛竖起”，可在当时，无论是“言者”、“闻者”，打心眼儿里“真情”俱足，“诚心”相示。或许你以“旧官僚”为理由而不相信“他”的话，那末，我再找几个“同龄人”——当时“学生领袖”的例子。

林希翎说：“……我国的经济基础现在基本上是公有制，这是不可动摇的，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它比私有制前进一步……社会主义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会……”（1957年5月30日在人大辩论会上的发言，摘自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批评右派分子林希翎等论文集》，下同）；北大谭天荣甚至在他的大字报《几句人情话》上喊起了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民主万岁/马克思主义万岁/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

我想大概不会有人怀疑当时年轻的他（她）们都怀有一颗爱国者的赤血丹心；那末，我想，你大概也就不会怀疑他（她）们“喊口号”时的确持有的真诚；“装逼”是“运动”派生出来的“病毒”，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方才七八年光景之“初年”，犹且生活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法理宣传口径之下的人们，多数都把“爱党”、“爱社会主义”与“爱国”视作“同一件事”。

六十多年过去，那场“事件”或曰“运动”早已淡出人们记忆；面对55万（或曰300多万）右派分子这一数字，面对这部《大辞典》录下的几万带血带泪名姓，予遗的吾辈不由地感到一种责任，肃然觉得自己的言行会被历史学者视为凭证，去解答一个：1957年春夏之间那场大规模的“群众性事件”何由得起的问题；那我们就必然会遇到质疑——1957年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诉求”到底有什么“差异”或者说是“分歧”？我的回答是：虽然他们口头上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因为“社会主义”并没有严格的定义，站在不同“立场”的“左”、“右”便有了抵牾与分歧。

我们仍然借林希翎、谭天荣的言论举例说明。

前文引林希翎之所谓“社会主义是最好最高最美好的社会”其实是她的“但书”，目的是为了引出下文：“……社会是前进的，满意现实社会就不会发展”，接着她就对“以党代政”、“法律是形式主义”、“等级制度、人事制度与保密扩大化”等等现行“制度”表示“不满”，因为，“马克思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生产力水平要完全超过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要非常民主，

根本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

谭天荣是北大物理系学生，但是他的文字却显露出更多的文艺和哲学气息。在他的大字报《一株毒草》中写道：“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而《再论》却把它归结为‘人们的思想情况’，这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又是什么”；谭天荣当时正是被南昌大学胡平教授讽为“下巴上刚刚长出茸茸软须的年轻人”，可是他却“自以为有了和中国对话的能力”（胡平·《禅机·1957 苦难的祭坛》，2004，广东旅游出版社），他所说的“再论”，乃是经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与苏共论战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讽刺谭天荣以“狂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为其狂妄的缘由动容——“为了那些被歪曲的灵魂，为了那些受残害的心灵，为了那些像树叶一样被踏的人们，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让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让我们携手前进吧！”（《又一株毒草》）

我以为，林希翎的一句话：“为了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了过真正人的生活而斗争！”（同上书 P.1）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群体意识”——“社会主义”应该与自由、民主、温情、人道相容并蓄。由此让毛泽东警觉到“真正社会主义”、“真正人的生活”与他这个政治家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歧义，立即放下脸来，会同其他高层，组织“左派”将右派或许真会有有的“斗争”（其时，上海、南京曾发生几起未出校门的“群体性事件”，“整风”时南京大学学生把大字报贴到了《新华日报》社大门口）扼杀于摇篮之中。这，就是我所理解的“57 事件”乃是一场“遭遇战”的“本意”——而且，这或许是毛泽东用《论人民民主专政》悄悄覆盖《新民主主义论》骗局的“必然遭遇”。

二．“双轨制”体现了毛泽东“社会主义”——“一把手”体制下不许“思想”只能服从的本质。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没有林希翎、谭天荣那样的“觉悟”，达不到“社会主义”应该可以与“自由”共存共荣的“理论高度”；除却因为与“旧社会”有各种各样渊源因而在历次“运动”中挨整的人之外，余者，很大一部分之所以会变成“1957 受难者”。

是因为“冤冤相报”似地“整风”时在“领导”面前提了“意见”。这些领导“官”不一定很大，“权”也不定规大小，却只要是所谓“顶头上司”，他（她）就可以整天在你耳边聒噪：“你得读什么书”，“你得看什么报”，“你得做什么事”，“你得说什么话”……相信我的同龄人瞟一眼这些省略号就会明白所欲之言，然而要想让晚辈“理解”，却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别说是今天那些醉心“快手”、“抖音”的小宝贝了，哪怕 80 后、70 后，乃至 60 后，又有谁能想象根据领导的指令“计划”的人生？！

我希望我的同龄人能为我作证，我一点都没有“胡说八道”，一点都没有“危言耸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毛时代”，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工作学习、

恋爱婚姻、生老病死都由“领导”说了算；你若“不满”，敢于“向领导提意见”，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苏联作家伊·爱伦堡在其名著《巴黎的陷落》中借“国家主义者”尼微勒之口说过一句话：“共产主义是一片美丽的草地，一切出头的东西都被剪草机剪平了。”我的体会是，吾辈之所以会成为右派，就是要求索回本就属于我的“个性”，如此而已。

2017年4月7日《佛佑文化》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武汉大学优秀女大学毕业生写的万言长帖《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文章告示了她主动拒绝已经多次来到了门口的辉煌，断然走向大山深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的原因就在于不满“教育”，她说：现在“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实际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这位女大学生如果就读于1957，肯定也是“受难者”之一；今天当然是“幸免”，但是，从她之言可知——六十年一个甲子过去，女大学生“觉悟”“指令式教育”（依然）有形无形地在扼杀、泯灭人的“个性”，然而我担心——即便是大山深处的“私立学堂”也未必能够容她“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

这位“优秀女大学毕业生”真应该好好翻阅翻阅这部《大辞典》；她的阅历还不足以使她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

2014年6月9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和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说：“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的问题。结论（好像）是没能做到“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然后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和制度藩篱……要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

2016年5月30日他再次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上发表“重要讲话”说：“要允许‘科学家’（小引号代替着重号乃笔者所加）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把中国打造成“世界科技强国”。

此前，2016年5月17日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讲了四个“必须”——“第一个问题：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第二个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第三个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第四个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

自然科学……不，错了，应当说是“科学技术”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它重点体属“（经济）基础”范畴；社会科学研究“意识形态”当然体属“上层建筑”。

共产党人是“唯物论者”；唯物论主张“存在决定意识”，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为“意识形态”反映“（经济）基础”。实际上，“自然科学”与

“社会科学”本就没有严格的区界，其边缘往往就是同一“界面”；比方说，没有人会怀疑数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的《数学原理》不是哲学著作，也没有人敢说物理学家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 1943--2018)的《时间简史》是一部哲学专著。

“基础”与“上层建筑”只是现实社会的两个“方面”，断然分开“个别操练”，却是难得一见的“奇葩哲学”。这种“个别操练”犹如命令行进中的士兵“右手右脚走正步，左手左脚走齐步”。其结果只能是走成不伦不类怪模怪样的“齐步”或是“正步”，再不然就是停下脚步，茫然四顾……

然而，这还不是“孤证”，而是中共的“习惯性思维”，那就是——“双轨制”！

大到“一国两制”，小到“企业单位”与“事业单位”不同的“退休制度”……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至少可以近视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晚清“洋务运动”。近当代则首推毛泽东，从滑天下之大稽的“窑洞对”、《新民主主义论》悄悄被《论人民民主专政》覆盖，直到他将“公权”攫为己有的独裁执政却又宣称是为了实现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创造了“言行不一双轨制”的辉煌“经验”，其特征是“拿着私盐当官盐卖”，“强奸然后做夫妻”！

我不禁想要请问有权主宰我们这些（当代言语谓之“吃瓜群众”）老百姓命运的“领导”一个问题——现代量子力学正在用“薛定谔的猫”冲击“唯心”与“唯物”的“界限”的今天，“您”到底打算在什么时候摆脱“一分为二”的混沌，还我们一条大家都在希望着的“合二为一”康庄大道呢？

三.《大辞典》——为蝼蚁般的生命而立的“丰碑”！

该结束了……

不仅是“双轨制”，更是我这篇（其实更像是《跋》的）《序》……

再次翻开《大辞典》，见得武宜三先生苦心收集得来的资料和评语——“湖南省在全国还不是最左的”……“南阳市不择手段地采取‘张网捕鱼’、‘促鸣放’、‘钓大鱼’、‘抓右派’‘阳谋’……然后，我看到了一个名字……我打算用这个人的‘故事’阐释我所理解的毛时代‘左’、‘右’与‘体制’、‘个性’的关系；诉说一点体悟——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无论是《多余的话》作者瞿秋白，或是蚁蝼般的你、我、他、她，有时，“左”或“右”其实只是人生中的一个“或然”；希望这则“故事”，这点“体悟”能对《大辞典》读者理解“1957”有所襄助。

我曾在拙著《丁酉纪事——荒原的隐私》“蓦然回首”一章中写过他，但是语焉不详，因为“详”不起来；我与他只有将近两年的相处；（我非常羡慕那些写狱中人物而能道其首尾的作者，“不幸”，）在我所经历的“劳改队”、“（刑满释放的）就业职工队”是经常要“编组、编队”以防所属的“分子”走得太近而“串联”生变的；他，便是在“故事”发生后的不久，由“青海省德令哈（劳改）农场直属工程大队二中队”调编至农场的“农业五大队”去了，后来的“听说”是“死了”，算来，时间应该是1967年。

他叫冯颐，江苏无锡市人（请注意，是“无锡市人”而不是“无锡人”），抗战时期就读于校址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毕业后一直从

事文字工作，“解放后”就职于上海新知识出版社第五编辑室（见本《大辞典》）；1956年“组织上”曾明确告知他参加“三青团”属免于追究的“一般历史问题”；然而1957年飞来一顶右派帽子，抓起来判刑（我记得是）15年。

那时我跟他编在同一小组，组长是剃头匠竺瑶田，河南人，此人非常“靠拢政府”，所以是指导员张胡子特别“信任”的“人”。竺年龄不很大，在家却是大队（行政村）干部——民兵连（排？）长，（共青）团支部书记；作自我介绍时他一定会加个“注”——“俺那都是正职，副职都是‘孺的’”。这个“孺”字是我捉摸着写的，他那家乡话（Ru）意指有职无权的“样子货”，所以我揣摩其意借用了孩孺的这个“孺”字。他说的都是实话，在劳改队当个小组长都十分霸道，说一不二，独断独行，完全可以想见当年的他在村里是多么的“威风八面”，因为他是村里的“高干子弟”，村（党）支部书记是他“大爷”。他的劳改案由是“破坏军婚”；那时军人复员、转业都由“政府安置”，所以村里的好姑娘都愿意给军人当媳妇。可是军人常年在外面，二十郎当长相也不丑的“高干子弟”竺瑶田便“供销眷顾”地干起了“明铺暗盖”勾当。时间一长，当然就有反映。然而有他“大爷”罩着，外面的军人回来除了打老婆之外也别无办法出气；可是1957年底乘“反右胜利之东风”，社会上开展“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不知是谁通了“天”，乡上（不久就变成“公社”）派来工作组，组长是个“戴眼镜”“上边口袋插着钢笔”的“吃屎（谐音‘知识’）分子”，“高干子弟”竺瑶田被抓起来判刑12年。

不过他在劳改队也挺“吃得开”，年纪不大，也实在谈不上“仕途”的他却颇懂得“做官经”；当然是“自学成才”，其实也简单，那就是甘心做个Satan，“官方”“学名”叫做“靠拢政府”。不过“靠拢”得拿捏主次、分寸，千万不可忘记的是《古田会议决议》传统“副职都是孺的”“一把手”政治；所以他深得二中队一把手指导员张胡子的欢心。张胡子在部队是个立有战功的连长，然而他有块不想人摸的“心病”——他是个由“国军战俘”入解放军之“伍”的“解放战士”。这事儿不可能不为人知，但是张胡子绝不容管下的犯人嚼此舌头，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他好像是领教过“吃屎分子”说起话来尖酸刻薄的“才能”；于是竺瑶田成为了保卫张胡子“名声”的忠贞卫士。

可以设想这个队，这个组上的“知识分子”的日子是不会好过的，作为内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冯和我，对此，体会更深。我是从（现在已经大名鼎鼎的）格尔木农场调来的“二进宫”；1965年我因地下写作“反动小说、诗歌”罪被格尔木市法院判刑4年，剥夺政治权3年，“反动”之“名”当然如影之相随跟到了新环境；然而，出人意料，在张胡子心目中我比冯颐“好”了十分……我之所以领悟所谓“左”或“右”其实只是人生中的一个“或然”，很可能“启蒙”于我和冯的“故事”。

上过战场的低阶军官，嘴边常挂着一句作为“带兵诀”的口头禅——“宁带十个恶的，不带一个善的”，也有别的版本：“宁带十个横的，不带一个屌的”，那意思就是宁愿自己的队伍中多几个平时吊儿郎当，不遵守纪律，“麻烦”不断，打起仗来却敢于冲锋陷阵的“刺儿头”，也不愿带一个平时循规蹈矩，枪声一响，双腿打战的“良善之辈”，这道理很简单，“军令如山”，他得完成上级交代下的任

务；张胡子也是这样的一位。工程大队盖房子，修水利，多是些克服地心引力的力气活；我一米八还要出头的个子“身大力不亏”，只要豆麦杂合面馒头管饱吃，别说干活，打架我也不含糊；因此，在张胡子和竺瑶田“统治”下，我的“日子”比冯颐“好过”。他的问题还不仅是劳动力差，关键是他摆脱不掉知识分子的“味儿”。这个“知识分子味儿”是个很难说清楚，却又是实实在在可以感知的“东西”，这“东西”，我看唯有俗话：“腹有诗书”后面的“气自华”三字庶几近之；其表现则像是由《论语》所谓“君子不器”而晋升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迂”。

我这是在“掉书袋”讲故事？或是泄私愤“发牢骚”？

不，不是！那是我带血带泪的体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至少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悲剧”！

回顾历史，中共靠“农民军”，“马上打天下”，“马上治天下”，除却“天”，统管一切。1949年前还可以应付，进城后接管从中央到乡村各级政府和专业职能部门就有点“管不过来”。怎么办？自任“领导”，统率“留用人员”、“雇用人员”运作起了一部二十世纪的“国家机器”。“困难”和“矛盾”是必然的；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矛盾”在于“人事”，那就是负责发号施令的“领导”与负责具体业务的两类“人员”之间的“矛盾”。领导必须“管事”，被领导者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所以就产生了“矛盾”，也就有了那末些个“政治运动”。

然而咱们顶多只能算个“事后诸葛亮”；今天，我们可以见到许多资料，上溯“延安整风”，下探“文革”，历数“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肃反”、“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反右”……乃至回顾1949年“农民军”进城后诸如安排“地下党”干部工作问题、解决进城（农民军）干部“婚姻问题”……无一不可从中检索出轻“城”重“乡”，扬“无产阶级（大老粗）志气”灭“（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信息”；然而，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发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名言时，有谁曾经质疑？又有谁“敢”探问聪明绝顶的他老人家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呢？！

没有，都没有，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喝了“孟婆汤”吃了“迷魂药”一样地地迷瞪，在“一把手体制”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大熔炉”中自觉地，“痛苦地”经历了自轻自贱的“思想改造”。

多年“改造”下来，冯颐也已经是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俯首帖耳”拜倒在“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的主儿，队上，组里，他也决不敢有任何轻贱农民出身大老粗的言论；然而他还是被竺瑶田之辈视为“好摆知识分子架子”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没有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知识分子“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句话的“意义”。

“士农工商”，几千年的“传统”，“农”总还是低“士”一头；仰视“士”几千年，“农”形成“自卑心理”当然也非在朝夕；“上进”何其困难，往下拽人相对容易；纵观毛泽东不能善待知识分子的一生，不少研究者认为与他在北大图书馆时受过“大教授”的“气”有关系——“打成一片”的真谛是“将高就低”。

比方说，如何面对“大老粗”日常的淫词秽语？比方说，对于“大老粗”的“待人接物”你又该如何“施”与“予”？

这都是“学问”啊！

你能相信这是“史实”吗？我的年轻朋友……

我又是否勾起了你痛苦的“记忆”？我的袍泽兄弟……

当过“三青团员”的冯颐年龄大我七八岁，但是这方面的“学养”比当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员”的我差了一截。举个例子。竺瑶田好下（中国象棋），棋艺也还可以，但是逊于冯颐。弈者好胜，十天一休的“大礼拜”，给人理发不觉累的竺瑶田便缠住冯颐“杀”上几局。“观棋不语”，“落子无悔”是规矩，可是这二人下着下着便起了争执，起因多半是为了竺瑶田“悔棋”。下棋不赌钱，何必这末认真？问题还不仅仅是“好胜”，关键是可以一步“将死”的棋冯颐不动“杀着”，偏偏改为“吃马”、“抽车”，他的目的是“褪光头”，甚至“吃将”前还要“推磨”，左三圈，右三圈，然后才“手起刀落”……

我曾经“劝”过几次，但是没用；在这棋盘大小的“空间”里冯颐“放纵”了自己……

于是有了那一天的“我”，有了那一天的冯颐……

那天，收工回来，吃过晚饭，院子里喊声不绝——“集合！”……“点名喽……”！

这又是部队里的“术语”——连、排、中队、小队召开全员大会叫做“点名”。

通常，“管教干部”给咱们做“报告”喜欢以“好话”开头，当然是承袭“七分成绩，三分问题”的老套套，“因地制宜”于劳改队便是：“你们这原先都是些啥人嘛！地主老财，识文断字，腰里挎着‘盒子炮’，一走动稀里哗啦屁后边跟起十来号人……现在坐底下乖乖听我讲话，那是个啥？那就是你们的改造成绩嘛……”不过，我记得那天张胡子好像没有念开场白，一上来就石破天惊——“咱队上出了现行反革命！……胆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唱反调……我告诉你，你的罪不是给你加个三年五年刑就可以打发的……你罪该万死！”

陡然一声尖利的嘶叫——“冯颐，站起来！”

已经是掌灯的时辰，席地而坐的人群中晃出了个抖抖战战的影子……

又一声呐喊——“绑起来！绑起来……”

明知是《劳改经》，却还是裆下酸酸麻麻，似乎要像冯颐，化作一摊泥去……

必须给这个“绑”字作个解释；因为我估计当下已经没有人懂得“绑人”是怎么回事；包括电视剧《白鹿原》导演刘进，他非常重视细节，《白鹿原》人物造型、台词、举动、服装都很“到位”，唯有几个“绑人”的镜头完全不是“那回事”。“绑人”的目的有两点，一是拘禁，二是刑虐。这就有了两点要求，为了限制被绑者的自由并且让他受罪就一定要用力将人绑紧，但是又不能把人绑死；所以绑人的绳索就不能勒在“颈总动脉”所在的颌下，绳索勒在前颈，绑紧就成了“绞刑”，松松地绑，人家很容易就溜之大吉。真正的绑人是在绳索中段

打一小死扣置于被绑者的后颈，两边的绳子左右分开经肩胛穿腋窝返回，然后分别绕于两臂，从上至下，到手腕处扣死，左右合拢将手腕交叉打成第四个扣，再将两个绳头穿入后颈窝处的第一个绳扣中，然后才是最后最关键也是最需要用力的一道工序——执行人将跪于地下的被绑者脑袋骑在胯下，一手牵绳，一手力握被绑者的手腕……倒霉蛋一声惨叫配合起执行人发力一声“嗨！”，被绑者的手腕已反剪到了后颈窝处，随即扣死，此乃第五个扣；五个“扣”似五朵“花”——“五花大绑”由此名扬天下！

以上“手法”属于“套路”，更有不同“学派”佐助——比如省却第一朵“花”以便倒霉蛋的反剪更加“紧密”，比如绑人前将绳子浸泡打湿绑到被剥去衣衫的受刑者身上以期绳索渐渐风干收缩深深勒入倒霉蛋的肉里，比如“五花大绑”外加暴晒和蚊蚋叮咬……都能提高“旁观者”的兴趣，满足“施虐心理”；另一方面，挨过绑的人或许会因此落下终身残疾；有一位在“旧社会”当过刑警祁姓“同学”对“非专业”行为颇为不屑，他说：“这算逮个啥嘛！一绳子下去，不伤筋骨就得让那货哭爹喊妈乖乖儿该说啥说啥这才叫个本事……”

一根绳子便有如此“学问”，你不得不对我“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五体投地。

然而恐惧还不仅仅来自那根绳子，更其的是来自茫然，因为你不知“罪”在何处；犹如夜行旷野，狼嚎狐啼伴奏着沙风从你身边掠过，嬉弄着你的神经，迫使你急切地想走出这片荒地，然而面对的却是无有一丝光亮的黑暗，踟蹰……于……胆战心惊……小心翼翼……你却仍然不知踏出的哪一步将是“灭顶”……

那晚并没有点明冯颐犯下不是“三年五年刑就可以打发的”具体“罪行”，反倒是点了我这“高级知识分子”的名，要我“揭发检举”冯颐“反革命言行”……

正是监狱一年一度的“冬训”，冯颐被“隔离”了；那不是“禁闭”，仍然睡在监房的大统铺上，只是无人与之言语；偶尔交换个“眼色”，也还是惶惶惑惑，不明所以……一直到第二天晚间“学习”冯颐再次挨了绳子，竺瑶田才亮出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痛不欲生的“反改造分子”冯颐的“反革命罪证”——见之，冯颐满地打滚；我则如同一跤跌进冰河里……

一张烂纸上写着一联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我的读者朋友，您可以呲牙，可以鄙夷，可以“哼哼”，可以不屑……却是求求您千万别下个“黑色幽默”评语！

亏得那时的我年轻、机灵，激灵灵来了主意，当即要求发言——“……虽然是两句唐诗，但是充分暴露了这末多年下来，冯颐仍然不认罪不服法的‘反改造狼子野心’……”

老浙大毕业生冯颐立即心领神会，接下来痛哭流涕上演了一场可以容得“目瞪口呆”立誓“痛改前非”“认罪守法”的好戏……

你说什么！……“滑头？”

别逗了；那叫“智谋”！听说过“大禹治水”的故事不？“禹”的父亲“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结果是“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后来“禹治洪水，通

轘辕山”，治水成功，当了“帝”；“疏导”是比“堙堵”更有效的处理“灾变”方法，这是可见之于《史记》、《山海经》的“大智慧”，既不“滑头”，也不像什么“以法治国”之类的废话；“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的“帝”就知道“以法治国”，人家“赏罚分明”，“渎职”“无作为”就该杀，“为人民立功”者有奖，甚至让出“皇帝”位子……

“有种”来个“以诚治国”试试！

后来，冯颐那事不了了之。

几天后，总场“机关”某位不知具体名姓的科长“证明”冯颐那两句诗的确出自唐人李商隐所作的《无题》；然而冯颐还是被“不了了之”到伙食比工程大队差了许多许多乃至吃不饱肚子的农业队去，结果是“魂兮……”

敢说他的家人也不会知道他（她）们的“丈夫”、“父亲”“魂兮”何处……

只有这本《1957 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上有

F 冯颐，上海新知识出版社第五编辑室编辑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

——摘自中共中央宣传部：《宣教动态（312）》

29 个字。

《大辞典》为什么就不能视为《墓志铭》呢！

尽管我们曾经的那“猪狗不如”的人生；

但是我就敢“骄傲”发声——1957 的右派是历史于某个时段上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特殊群体，犹如明末的“东林党人”，不过人数要多得多，多得多，多得多，这就难免“良莠”；但是“瑕不掩瑜”——林昭、林希翎、沈泽宜、谭天荣、许燕吉、刘宾雁、高尔泰、张先痴……

请原谅我不能……其实也无需一一点名；主编武宜三先生目前已掌握近 6 万份材料，目标则是 10 万份；（官方认定）右派人数 55 万，民间估计是 300 万人；无论是 6—10/55，还是 6—10/300，都是统计学所谓之“大样本”——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我说：功德同样也自在人心！

上点年纪，“火气”消了许多，“老庄”就悄悄爬来心窝；有老同学劝我：

“你我皆是老百姓，管他唐宋元明清。”

我则以“再与老同学商榷”——

你我本然老百姓，只缘识得“I AM WHY”；

“管他唐宋元明清”，何必自诩“读书人”。（2018.8.2 初稿）

〔作者魏燮中，笔名丁酉、江寒，男，汉族，1935 年生于青岛。1957 年在南京农学院被打成右派分子，在青海格尔木农场、德令哈农场劳改二十多年。1980 年回南京农业大学工作，1995 年退休。著作有长篇小说《禅灯》、纪实小说《丁酉纪事——寻找故乡、荒原的隐私》等。〕